



通俗军事知识丛书之二

言 兵 录



长征出版社

出版说明

本书收辑了解放军报《学军事》副刊近年发表的部分军事杂文，内容涉及到：一，军事学术领域的思想解放问题；二，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军事学术研究和军事训练改革；三，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加强军事指挥员的修养。文章具有一定思想性和知识性，有助于开阔视野。为了阅读方便，编排按上述内容及顺序相对集中。部分文章（包括标题）略有删改。文尾所注日期系见报时间。

目 录

胜利者的丰碑

- 敢于摈弃光荣而过时的观点 龚炜楠 (1)
从反“洋教条”谈到“土教条” 龚炜楠 (5)
矫枉不必过正 龚炜楠 (8)
改革家的胸怀 龚炜楠 (11)
六〇炮“回娘家”和传统战法 姚有志 董其高 (13)
由拿破仑的盛名引起的联想 孙 竞 (17)
吴佩孚用兵 蔡小洪 (21)
劝君莫做“长妈妈” 石玉山 (24)
解放思想不能跳跷跷板 陈惠邦 (25)
一颗原子弹打出来的问题 丁炳辉 (26)
应当学点军事唯物论 杨家祺 (28)
“巧于用昼，拙于用夕” 陈忠龙 (31)
道丁胜戈林的启示 孙 竞 (33)
不可削足适履 陈忠龙 (36)
莫把“指针”当标签 高俊合 (39)
现代化与“土办法” 李卫平 (51)
尚布雷总监劣中探优有感 孔令铜 (53)
长短录 龚炜楠 (46)
“木牛流马”略考及其它 周先国 芦增福 (49)

“无底洞”和武器装备更新	赵振英	(51)
力量和力量的运用	侯观发	(53)
烟幕重返前线说明了什么?	石志远	(55)
军事学术研究应在广阔领域里展开	王辅一 赵焕文	(57)
“兵事”不可“易言之”	姜放然	(60)
“急中生智”杂谈	姚有志	(62)
“昏镜”与“明镜”说	石志远	(65)
兵器使用上切忌“以一应万”	祖 眉	(67)
“来头”解	陈朝鲜 邝书斌	(69)
剑与笔	曹应龙	(71)
借鉴的学问	陈忠龙	(74)
以古为镜与以古为据	郝留德	(76)
学术研究不可喧宾夺主	陈忠龙	(78)
“经”之辨	刘胜俊	(80)
“窥一斑”与“观全豹”	朱林广	(82)
提倡当一当反面角色	曹罗生	(83)
注意研究对手的特殊面	张纯明	(85)
“变”字解	郝留德	(87)
切忌“斗角掉尾”	于志勇	(89)
有感于侦察兵当调整哨	彭秀良 曾凡友	(91)
小谈用“佯”	姜放然	(94)
“颠倒配置”的启示	孔来云	(96)
以劣胜优应注重研究战术	保 和 和平	(98)
在“单位时间”里争优势	严国群	(100)
“宝塔及“宝塔式训练法”	赵守义	(100)

三角锥及其他	刘忠信	(104)
“研究性演习”之研究	陈向民	(106)
“对等研究”析	李国俊	胡如华 (107)
原则与应变	田新建	张 胜 (109)
也谈数中有术	查金路	(111)
“配属”不等于“配角”	冯明青	(113)
一个有益的笑话	周立柱	(115)
莫怪“泥巴堆子”	俞维勤	(117)
指挥员精神世界中的“正方形”	石玉山	(118)
“戈蒂恩结”是怎样解开的	伍逢享	李树发 (120)
修养篇	孙 竞	(122)
约米尼的“假设法”	李卫平	(125)
谈谈指挥员的性格陶冶	魏尤龙	(127)
学贵求新	孔来云	(129)
常识与计谋	姜 祥	(131)
知识·智谋·勇气	郝廷华	(133)
读《灯下集》有感	蔡小洪	(136)
从圣经的启发说起	侯建国	(139)
“一人敌”与“万人敌”	孙方安	(141)
“纸上谈兵”议	梅书坤	(143)
抱住当今之“机关枪”	远 近	(144)
“败将”与“胜将”析	陈建芳	郭 峰 (146)
胜败小议	刘忠信	张丽荣 (149)
从“陆逊拜将”说到威望	曹罗生	(151)
军事慧眼与独立思考	曹罗生	(153)

- 信任也是战斗力 崔威臣 (154)
学会利用“后台”演戏 赵振英 (156)
在敌人失算以后 孔令铜 (159)
谋贵用疑 黄培义 (161)
疑而有度 陈光远 (163)
有感于王长恭蒙面上阵 侯建国 (165)
藏密与“泄”密 美放然 (167)

胜利者的丰碑

——敢于摈弃光荣而过时的观点

龚炜楠

大凡有机会去法国巴黎访问的人，都不会忘记观光一下矗立在戴高乐广场上的凯旋门吧！那是一座威严雄伟的建筑，也是一座荣誉的丰碑。据说，最早建造凯旋门的是罗马人，他们每当取得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都要建造一座凯旋门以示纪念。在历史文明悠久的巴黎，凯旋门也不是一座。

是啊！胜利者的光辉战果应当庆贺，胜利者的成功经验也需要汲取。可是，凯旋的歌声常常也是新战斗的号角。当你站立在胜利者那荣誉的丰碑之下啧啧赞叹之际，你是否想到过戴高乐将军这样一句名言：胜利者应当摈弃“曾给他们带来光荣但已陈旧过时的观点”。

戴高乐将军的这句话是从血的教训中得来的，应当说是经验之谈。

人们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在凡尔登地区利用阵地战击败了德军多次猛烈的进攻。这个决战性的战役确实给法军带来了胜利和光荣。当他们凯旋归来的时候，凯旋门前鼓乐升平，热闹非常。

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现象：胜利者总喜欢把他们成功的经验当作包袱背起来，从而变得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直到在新的较量中吃了苦头，碰了壁之后，方能醒悟。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也算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军事领导者正是按照“福兮祸所伏”的逻辑转化的。

就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随着飞机和坦克的高度发展，“闪击战”的理论已逐步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法国戴高乐等一些比较注重实际的军事人员，都主张建立一支强大而机动的掩护部队，由统帅部直接掌握，担任机动防御任务。可是，思想僵化的法国军界最高层，却顽固地坚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沿袭下来的阵地防线的理论。他们将自己拥有的大量坦克分散配置在各个防御地段，因而也就不可能集中起来建立一支强大的快速战略预备队，以机动防御抗击敌人大规模坦克集群的进攻。结果，当德国闪击荷兰、比利时得手，主力从阿登山脉向法国突击时，法军大部分兵力呆在马奇诺防线里无所事事。紧接着英法合演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便是巴黎的陷落。凯旋门下，迎来的不是胜利者，而是一场亡国的悲剧。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当局，是一些老朽不堪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他们的思想僵化是受阶级的偏见所限；那么，我们还可以从苏联的卫国战争初期引出一些教益来。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卫国战争是伟大的，他们那些成功的经验，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若从教训这方面来讲，我想，造成苏联在战争初期吃苦头的多种因素中，军事上的因循守旧应该说是其中的重要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的胜利，如果说也需要建造一座“荣誉的丰碑”的话，它应该比巴黎的凯旋门高

大许多倍。然而，胜利给人们带来的荣誉，在无产阶级身上也同样可以变成包袱，这个包袱发展到斯大林同志搞个人崇拜时已经相当沉重了。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闭关锁国，唯我独“革”，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好，对于外国的军事理论、军事学术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根本不屑于去研究。

人们知道，在德国发动侵波战争之后，欧洲还爆发了一场苏芬战争。抛开这次战争的政治原因不谈，苏芬战争和德波战争，都是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的战争。可是，德国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就使波兰投降了，而苏联在芬兰的泥沼里足足拖了四个月之久，原因之一就是军事上的守旧。西方一位军事评论家这样写道：“从俄军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和行政经济机构来看，最重要的是使希特勒得出这个结论：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的俄国军队，仍然停留在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的水平上。”

不过，斯大林终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象西方某些军事头面人物那样固执己见，他能够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敌为师，改变对策。当战争初期苏军吃了一些苦头之后，就马上改变了原来那种企图通过处处设防，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速胜论策略，采取积极防御稳定了战局。与此同时，苏军在编制和作战方式上也进行了许多重要改革。在这期间，引人注目的是些军事人物的变迁。为适应新的作战方式的需要，斯大林免去了铁木辛哥、布琼尼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步骑兵创造过卓著战功、但思想已经僵化的将帅，起用了象朱可夫等这类思想比较解放、善于组织指挥机械化战争的后起之秀。正是在血和火的考验面前，苏联军队进行了一

系列变革，才使卫国战争由悲剧开幕，而以喜剧收场。

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落后的武器装备固然需要不断更换，但更需要改变的是那些陈旧的军事学术观念，而这些陈旧的观念一旦穿起华丽的服装，就很难被人们所放弃。这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它的“光荣”，而忘却了它的陈旧；只注意研究它的历史意义，却忽视研究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正象人们参观巴黎的凯旋门时，倘若只是将它作为历史文物去欣赏，自然感到越古越好，越能保持本来面目越好。殊不知军事学术研究不是单纯为了“考古”，而在于指导未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真正的“荣誉丰碑”，应当属于那些敢于创新的军事改革家，属于那些不仅在第一场比赛中已经取得胜利，而且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场、第三场比赛中仍能赢得胜利的军事家。

(1980年5月9日)

从反“洋教条”谈到“土教条”

龚炜楠

这个题目在我脑子里转了很久，直到最近看了工程兵文工团演出的《滚滚的黄河》之后，才提起笔来。

《滚滚的黄河》这出戏，说的是一九五八年夏天，黄河洪水冲断了郑州铁路大桥，敬爱的周总理亲自调集舟桥部队在汛期抢架浮桥的故事。剧情是围绕着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展开的。剧中那位架桥副总指挥徐星才，由于照搬照套苏军架设浮桥的教材规范，脱离黄河的实际，两次架桥都归失败。后来，在周总理的亲切教导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跳出洋教条的框框，注重调查研究，胜利完成了架桥任务。我的观后感，不是这出戏在艺术上的成就，而是想透过剧情背景，即一九五八年在全军展开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说几句有助于今天思想解放的话。

老同志都记得，一九五八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主要是围绕着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如何看待和学习外军经验这个问题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这桩历史公案，党内已有了公正的评说。今天，只谈一点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为什么五十年代用那么大的声势批判“洋教条”，却没有使我军真正解放思想，坚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伴随而来的却是比“洋教条”更严重的“土教条”？分析原因，自然与林彪、“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猖獗、神化领袖分不

开。可是，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土教条”的幽灵竟然又借两个“凡是”还魂，这就很值得进行一番解剖了。

在话剧《滚滚的黄河》中，周总理说过一句非常切中要害的话：无论是洋的、土的，都必须从黄河的实际出发。苏军舟桥部队架设浮桥的教范，在顿河、伏尔加河、第聂伯河上可能是适用的，但拿来用于中国的黄河、长江，就不完全符合实际。这并不是说学习外军、甚至以敌为师的策略思想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把人家的东西拿来要消化。同样，对我们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也不能完全照搬。话剧中提到，我国晋朝人、唐朝人就在黄河上架过桥。这可能是事实，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丢开外军的有益经验，一味照搬古人的就行。

从这里可以看出，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树立两个观念：一个是空间观念。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都有自己不同的客观实际，从伏尔加河到黄河，地点、环境变了，指导架设浮桥的条条也必须修改。一个是时间观念。一切客观实际，都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晋朝人在黄河上架设浮桥的经验，之所以不能完全用于今天，是因时间不同了，条件发展了。古人架的浮桥，我想载重量是很小的，顶多能通过几辆马车就行了，而今天却要通火车，过坦克。所以，宇宙观也可以说是时空观。两个“凡是”的危害，就在于无视时间空间的变化，去削足适履，刻舟求剑。

有人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完全适用于我

们的国情和军情。这话说得对。不过还应补充一句：在中国产生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也同样需要不断地发展、充实、修改，也不能一成不变。《孙子兵法》产生于中国，但今日作战，就不能完全照搬古人的那一套。更不用说，我们在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部队教育训练时，还有个从具体情况出发的问题。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洋教条不能搞，土教条也需要抛掉。

(1980年2月15日)

矫枉不必过正

龚炳楠

进行军事方面的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一样，都是要向前开拓。它不象循老路那样轻松、便利、保险，所以也就难免会出偏差。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前进中的曲折，主流中的支流呢？一种态度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帮助我们的同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继续前进。另一种态度则是否定一切，走极端，弄得黑白不分，使同志不知所措。

五十年代，我军在向现代化、正规化转移中，学习外军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虽然在某些方面搬了一点“洋教条”，搞了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但这与成绩比起来，只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可是，在反教条主义的运动中，人为地把本来属于前进中的缺点，当作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批，全盘否定了学习外军的必要性。结果，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闭关自守来了，因循守旧来了，照搬照套的本本主义来了。正如中国的一句老话：过犹不及。

倘若考究一下这种好走极端的理论根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叫“矫枉必须过正”。

不错，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引用了这句话。那时，作为一个阶级要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说，“矫枉必须过正”是完全对的。一千多年来地主阶级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农民，一直在“过”农民阶级的

“正”，现在农民革命运动起来了，当然要反其道而行之，“过”地主阶级的“正”了。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权建立后，无产阶级的军队在克服自身建设中的缺点时，难道还需要自己“过”自己的“正”吗？还需要自己打倒自己，再踏上一只脚吗？

从本质上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而矛盾对立着的双方又必然有一方居于主要地位，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居于次要地位，即矛盾的次要方面。所以说，一切事物原本都处于“过正”状态。如果你再要矫枉过正，那就是要改变矛盾双方的主次位置，这一来，事物的性质也就变了。五十年代的学习外军，在成绩与缺点这对矛盾中，本来成绩是主要方面，缺点是次要方面，学习外军这件事是好的，应当肯定的。但经过“矫枉必须过正”之后，使矛盾对立着的双方的位置变了：缺点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成绩变成了矛盾的次要方面，学习外军也就变成了一件坏事。

有的同志好把“矫枉必须过正”作自然主义的解释：一根铁丝向左弯了，你要想把它弄直，非得向右扭到超过它的垂直线不可。如果按照这种自然主义的理解来指导我们的“纠偏”工作，必然得出这样一个逻辑：对来自“左”或右的干扰，都不能用正确路线去纠正，而只能用“左”去纠正右，用右去纠正“左”。纠来扭去，我们的工作必然沿着两个极端跳“摇摆舞”。

在“矫枉必须过正”盛行之时，动不动就是彻底批判某某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判”这个词，马克思、恩格斯用过多次了，它的本意是扬弃，即剔去糟粕，吸取精华。我们却把它当成了否定一切的手段。似乎给孩子洗过澡，非得

把脏水和孩子一块都倒掉，才显得比人家都革命。

今天，我军走过了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一段曲折路程之后，又重新向现代化建设转移了。在这当中，还难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缺点，所以说还有一个用什么态度对待我们前进中的曲折、主流中的支流的问题。我们应当记取历史上的教训，不要再搞那种“矫枉必须过正”了。

(1980年2月22日)

改革家的胸怀

龚炳楠

当我在研究五十年代批判教条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恰巧接触了两位在军队院校工作的老同志。我军当年向正规化、现代化转移时，他们都曾是立志改革的闯将，后来一反教条主义，都成了射击的“草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俩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历史经验。当我分别和这两位老同志谈到我军教育训练的改革时，一位同志激情满怀，滔滔不绝地谈了不少具体的改革设想和建议，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勇气不减当年。另一位同志则寡言少语，长吁短叹，说不出多少道道了。他们表现出来的不同情绪，使我联想起这篇短文的题目——改革家的胸怀。

改革家是应当有点胸怀的，而宽广的胸怀常常和站得高、看得远分不开。“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历史象滚滚的黄河浪涛一样向东流去，我们今天看问题，应当“更上一层楼”。

任何军事方面的改革，都要开拓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总是要超出一般人按常规走路的方式，所以也就难免遇到一点“冷眼”，遭到几句“非议”。倘若不能“更上一层楼”，被个人得失的巫山烟云遮住眼睛，就很难看到那光辉灿烂的前途了。

历史上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是大家所